

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

12

两宋经济
政治问题

邓广铭 漆侠著

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

12

两宋政治经济问题

邓广铭 漆侠著



21167093



知识出版社
上海

1167093

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

12

两宋政治经济问题

邓广铭 漆侠著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古北路650号)

(沪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毫米 1/32 印张 7.375 插页 4 字数 182,000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015-5347-5/K·26

定价: 2.70元

序 言

(第二辑)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1983年暑期所举办的第一期“多学科学术讲座”的基础上，于1984年又举办了第二期“多学科学术讲座”。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1984年分两个阶段举办了“多学科学术讲座”。第一阶段在暑假中假北京师范大学校址举行，共有：费孝通的《社会调查》、陶大镛的《世界经济和当代经济思潮》、邓广铭、漆侠的《两宋政治经济问题》、唐敖庆的《量子化学的应用》、林传鼎的《智力开发的心理学问题》、冯之浚的《现代化与科学学》、张远谋的《工业结晶》、管锦康的《审计学》、谈家桢等同志的《生物工程》，以及韩伯林的《世界桥梁史》。第二阶段将在1984年年底举行，主讲人有：常迥的《信息科学》、王铁崖的《海洋法的新发展》、张文佑的《地质学》、张胜瑕的《内燃机排气的污染与控制》等四讲。

1984年的各讲稿，其中除《地质学》和《工业结晶》业已在其他出版社出版外，其余十二讲稿将编入“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第二辑，它和第一辑一样，仍由知识出版社(沪)陆续出版。

这次讲座的主讲教授都是民盟盟员，象费孝通、陶大镛教授又都是民盟中央副主席。他们都是我国知名学者，他们毕生从事某一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在百忙中，不仅亲自上台讲授，并且写出了讲稿，提供广大读者参考学习之用。

1984年的讲座，除了继续为盟内和国内外知名学者提供讲台，讲授他们毕生从事的学术成就外，也结合我国四化建设，讲授了有关各种新技术、各种管理科学等内容，以满足各方面的要求。

民盟盟内有大量专家学者，为了更有效地动员起来，为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四化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将在以后几年内继续举办“多学科学术讲座”，其讲稿也将陆续在“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中发表。

钱 伟 长

1984.10.31



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

第一辑

- *1. 美学和中国美术史
朱光潜 黄药眠 常任侠
- *2. 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
关梦觉
- *3. 广义变分原理
钱伟长
- *4. 光纤理论
叶培大
- *5. 语言信息和语言通信
马大猷
- *6. 我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问题
钱伟长等
- *7. 谈《红楼梦》
张毕来
- 8. 中国文字学和训诂学
商承祚 陆宗达
- *9. 新闻艺术
徐铸成

有*者已出版

DA69/22 . DA6P/11

~~DA69/20~~

目 录

一、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1
(一) 应当建立一支研究宋史的宏大队伍·····	1
(二) 必须正确估价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3
(三) 怎样研究宋代的历史·····	10
二、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	15
(一) 宋太祖、太宗的创法立制和宋朝家法的形成·····	15
(二) 庆历新政与王安石的变法·····	21
(三)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与宋朝家法的关系·····	29
三、南宋初年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	35
(一) 南宋初年政府内部抗战派与退让投降派的斗争·····	35
(二) 秦桧的当权及其出卖主权、土地与人民的罪恶 活动·····	41
(三) 围绕着所谓绍兴和议的斗争·····	44
四、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 中所处的地位·····	53
(一) 两个马鞍形·····	53
(二) 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北不如南,西不如东·····	70
(三) 余论·····	84
五、宋代封建经济制度的演变·····	91
(一) 夔峡诸路的庄园农奴制·····	91
(二) 广大东方诸路的封建租佃制及其特征·····	100

(三) 封建租佃制关系在两浙等路的进一步发展·····	107
(四) 论宋代封建经济制度演变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115
六、宋代的土地占有和社会的再生产·····	120
(一) 宋代人口的增长及阶级构成·····	120
(二) 宋代社会各阶级的土地占有状况·····	126
(三) 宋代社会的再生产·····	132
七、宋代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142
(一) 从生产技术的进步看宋代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142
(二) 从手工业生产的分工看宋代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150
(三) 从各手工业内部分工、生产规模、匠户数量和 产品数量看宋代手工业的发展·····	155
八、宋代手工业内部诸关系的变革·····	162
(一) 矿冶中从应役制到招募制的变革·····	162
(二) 官府作坊中工匠从应役制到雇制的发展·····	171
(三) 私营手工业作坊及其与雇工的关系·····	176
九、宋代城市经济、商业的发展·····	183
(一) 宋代城市、镇市和草市的发展·····	183
(二) 宋代商品的构成及其流通·····	191
(三) 宋代货币及其流通·····	195
十、宋代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	204
(一) 货币的集中和贮藏。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 形成·····	204
(二) 商业资本及其活动·····	209
(三) 高利贷资本及其活动·····	214
(四) 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转化及其在历史上的 作用·····	221

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 应当建立一支研究宋史的宏大队伍

就我国目前对各个断代史的研究情况来看，辽宋金史的研究是断代史研究中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与日本学者对辽宋金史研究情况相比较，我们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辽金史的研究方面，也得承认是落后一些的。现在只谈谈宋史的研究。

宋史研究在近代之所以不曾得到长足的发展，原因之一，应在于前代人没有给我们遗留下较多的研究成果。《宋史》一书在元代末年修成以后，明代即有很多学者对之很不满意，有的要重修而未果，例如汤显祖、归有光等；有的则已有成书，例如王洙的《宋史质》、柯维骐的《宋史新编》、钱士升的《南宋书》等。但明代学风，驰骛于空疏议论者较多，而笃实缜密则非所趋重，故上举诸人，不论已有成书与否，其着眼点之所在，都不外乎“史法”、“义例”、“文章”、“褒贬”等事，却不注意对元修《宋史》史料的增补和失误的订正诸方面。对后来之研究宋史者实无多少助益可言。清代的史学家们，包括乾嘉学派的人物在内，因大都没有机会看到《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所以致力于宋代史事之研究而成为专书者，仅有清末陆心源的《宋史翼》诸书，是颇见功力之作。原因之二，似乎是在于没有足以震动一时的新史料的发现，象商的甲骨，周的钟鼎，秦汉的竹简木牍，敦煌石室的北朝隋唐文书，明清的档案等，因而缺乏一种刺激和吸引的力量，不能使大量历史学家趋向于宋史这门学科之故。

但是，前代人没有为我们遗留下较多的研究成果，这固然是一件不幸的事；而没有足以震动一时的新史料的发现，却又使有关宋史的资料有较大的稳定性，不会象其他断代那样，因为有层出不穷的新史料，以致常常使昨日研究的成果，今日又可能为新的资料所动摇或推翻。而就现存的宋代史料，对任何一个宋史研究者来说，也是异常丰富，足供搜讨和采择的。这是因为，宋代刻板术已极盛行，造纸术也有很大的发展，所以各种文字记载之流传于后世者特别多。其中，不但有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等体裁的历史著作，即使对于古代经典的注释中，也常有涉及当代军国大事的评述；笔记杂谈一类书中专记时事的也非常多，而各种文集集中的碑传墓志更多与一代史事相关联。清代的章学诚曾说“六经皆史”，我们对宋代人的著述来说，则更不妨说四部皆史。既有如此丰富的史料遗存，又没有新发现的史料对它们进行冲击，这对于今天的宋史研究者来说，应该是一种最有利的条件。有了这样的条件，则前代研究成果之少，也正可以变不利为有利，正便于我们纵横驰骋于宋代历史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角落，去做一些具有开拓性、开创性的工作，不患英雄无用武之地。更何况对于前代人已经作出了研究成果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应当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方法的指引下，去一一重新给予估价和考察，用武之地就更为无限了。

我们不应当容忍宋史的研究长此落后于其他断代，甚至落后于域外学者对于这一断代的研究。我们所有有志于宋史的研究者，应当群策群力，分工协作，以迎接挑战的姿态（因为事实上我们早已面临着挑战了），深入地进行一些理论的探讨，踏踏实实而又穷搜博采地收集一些资料，把宋史的研究开展起来，使我们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说，这是我们应当作出的贡献，也是我们能够作出的贡献。唯一的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必须以拚搏精神，付出极大的努力，而不容许

寻求捷径，甚或投机取巧！

（二）必须正确估价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说明，封建社会在当时还具有很旺盛的生命力，还处于向前缓慢发展的阶段，而不是已经到达了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也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

且举一些事例来论证上述的论点：

1. 农业生产方面，在江南湖泊水渠较多的地区，北宋期内已出现了大量的圩田，这使农业产量得到很大的提高，因而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谣。

2. 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虽开始于汉代，而其普遍盛行和技术的大量提高，则是宋代的事；火药和刻板术的发明虽都是唐代的事，但此两者之被广泛采用也都在宋代；发明胶泥活字的毕升也是北宋人；指南针的发明则无疑为宋代的事。

3. 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很多关于科学技术的事，反映出宋代科学技术较前代大为提高。

4. 哲宗时曾做过宰相的苏颂，发明了一种名为水运仪象台的报时器，也可简称为天文钟。其中已经使用了擒纵器。

5. 两宋海上贸易之盛，远非前代之所能比。运往国外的物品，主要为丝绸、瓷器等，这也反映出这两种物品产量之高和种类之丰富。

6. 在精神文明方面则是：

(1)文学——北宋前期的士大夫们已在大力提倡写作韩愈、柳宗元式的古文，使宋代文风较前代起了很大变化。所谓的唐宋八大家，北宋一代就占了六名。改骈为散，对于学术文化的传播有

很大便利。为了配合音乐，便于歌唱，由五七言诗衍化而成的长短句，即“词”，在宋代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元明清诸代之所不能企及。

(2)史学——宋代史学的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也是最高的。在官修的史书当中，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类别的书，所记录的都可称为原始资料，尽管其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弄虚作假的东西。我认为，宋代史学的发展，主要的不是体现在官修史书种类之多，而是体现在私家著述的质量及其所创立的体裁方面。且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例：

对于司马光的政治主张及其实践，似乎都很难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对他在史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却应予以充分肯定。司马迁自述其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时虽不曾标举出这样的宗旨，而实际上却也体现了这样的宗旨。他在编写《通鉴》时，首先把有关资料编写为“长编”，最后则又把不采入正文中的歧异记载收入另册，名曰《考异》，与《通鉴》并行。在历史编纂学方面，从此开创了一种新的而且是很好的方法和体裁。于正书之外再有《考异》，就可以使后来的研究者有“递相稽审，质验异同”的余地了。南宋史学家李焘的《续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书，于每条记事之下，大都附有大段的注文，胪列各种异说异文，虽没有辑成专书，称作“考异”，与本书并行，实际上却完全是沿用《通鉴考异》的做法。可见司马光新开辟的这条修史蹊径，对于后代的史学界起了何等重要的影响。

李焘遵循司马光编写“长编”时那一“宁失之繁，毋失之略”的原则，和胪列异说以便读者参考抉择的办法，所以，他虽然是一个“耻读王氏（按指王安石）书”的人，而在他的《续通鉴长编》记宋神宗朝的史事当中，却大量引用了王安石的《熙宁奏对目录》，有的写入正文，有的附入注文之内。在这部《目录》久已亡佚的情况

下，我们正可藉此深入了解有关变法的一些议论和周折。另如关于宋太祖太宗兄终弟及时“斧声烛影”事件，李焘写在正文中的文字并不太多，而注文中所附录的各种记载却是“连篇累牍”，又复不加辨析，以致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考据未明”，使成“千古疑窦”，其实李焘对于此事一定是不敢直书其所见（看来他是认为太祖乃为太宗所害的），故意地引录众说，使之迷离惝恍，启读者之疑窦的。这也正好体现了“考异”的一种妙用。而“考异”又是前代任何史学著作和宋朝任何一种官修史书中所都没有的。

着重于当代史的记述，是中国史学家们的一个优良传统，司马迁《史记》的最精彩部分即在于秦与西汉前期的一些叙事；陈寿的《三国志》也可算是以当代人记当代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最精彩之处，则是唐至五代十国部分。然而唐和五代还只算是司马光的近代史，依照司马光的设想，原是打算在写完《通鉴》之后再着手写一部《资治通鉴后记》，即专写北宋建国后的历史，也就是司马光的当代史。他早已开始了积累资料的工作，可惜他的这一志愿最终未能实现。而李焘的《续通鉴长编》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及许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等书，却都是以当代人记当代事了。可见着重当代史的这一优良传统，在两宋的史学家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发扬。

(3) 哲学思想——北宋的思想家，对于从汉到唐的儒生拘守其各家的师法，并拘限于章句训诂之学的学风，大都深致不满，都要对儒家经典所涵蕴的义理进行阐发，遂形成了一种与汉学对立的所谓宋学。过去，人们大都把宋学与理学等同起来，这是很不恰当的。理学（即《宋史》所称“道学”）是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才形成的一个学派，一直到11世纪之末，即宋徽宗即位之前，在北宋的学术界是不存在理学家这一学派的。

着重于阐发儒家经典义理的宋学，也可以称作新儒学。事实上，它是儒家学者与佛家学者和道家学者在长时期的互相排斥、互

相斗争、互相渗透、互相吸取之后的一个产物。黄老学派，以及由这一学派演化生成的道教，全是中国的产物，久已与儒家学派在发生着既排斥又交流的关系，不只宋代为然。对此问题，姑置不论；下面只略述佛学与儒学的关系。

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是宗教而不是一个学术流派。魏晋南北朝期内，佛教经典著述大量译为汉文，才传入了佛学。当时，玄学与清谈之风正盛行于士大夫之间，其内容乃是儒家思想与老庄思想的混合物，这正好为接受佛典及其义理准备了条件。故在南朝，讲习佛教的经、论之风即大为盛行，出现了一些知名的经师和论师。及讲说日久，在理论上既各有发展，且多与儒家道家的互相糅杂，从而各派也不再恪守经说，大多有所改造。例如天台宗、华严宗所讲论的均已不是印度的原貌。禅宗所倡导的“佛性本自具足，三宝不假外求”和“顿悟成佛”诸说，即皆出自魏晋玄学，全非来自印度。从隋唐时起，各教派即都自认为“得正法”，受真传，藉为本派力争正统地位。还都极力抬高本教派的传授历史。例如，中国僧人所创立的禅宗，定要追认菩提达摩为其始祖；天台宗也定要上溯至北朝的慧文、慧思。各派都搞“定祖”活动以争取法统、道统中的正统地位。

受到佛教争法统(道统)的影响，唐代的儒家人物韩愈便首先在《原道》一文中也提出儒家道统的继承问题，说什么“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此说一出，后来的儒家便一致接受并世代相传。理学家并不推崇韩愈，但对于“道统”之说则不但接受而且维护。

佛教徒众的生活来源，最初只靠行乞与“受请设会”(即由施主布施)，但南北朝的统治阶级大多崇信佛法，寺院财产均极雄厚。这对各教派的发展有极大推动力。到唐代，经济基础雄厚的寺庙即频频举行僧讲(专对僧人讲佛教经典)和俗讲(专对世俗人讲通

俗道理以募集钱财)。

儒家学派的人也因此而受到启发和刺激，故在唐末五代就开始出现了儒家创建的书院，到宋代出现得更多，且有著名的四大书院。

儒家学者之所以要抛弃汉唐学者的章句训诂之学而趋重于阐发经典中的义理内涵，其内在原因固然在于对汉儒繁琐哲学的厌弃而要转移方向；其外部原因则在于看到佛教的那些学问僧都在讲说心性之学，便也想在这一方面能与之较高低之故。与韩愈同时的李翱写了一篇《复性书》以阐发《礼记》的《中庸》篇中“尽性命之道”的道理，是从事于这种努力的第一人，也可以说他是宋学的一个先导。

既然要在讲说义理方面与佛教学者和道家学者争高低，便不能不把佛学和道家的理论中可以吸取的部分尽量加以吸取。生活在宋真宗、仁宗之际的一个名叫晁迥(993~1059)的学者，既“崇尚佛乘”、“归心释教”，又把“老庄儒书汇而为一”，而他却始终是以一个儒者的面目出现。尽管他在《宋元学案》中并未占有一席之地，但他的这种学风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

《宋元学案》把胡瑗列居宋代学者的首位。胡瑗所著《安定易说》、《周易口义》等书，全是着重于义理的阐发，而对于《易》中的“象数”则“扫除略尽”，成为宋代以义理说《易》的先驱。这也是受到了释家讲说心性的影响的。他先后在苏州和湖州的州学中作教授，把学会分为两种：经义斋和治事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这可见，胡瑗的治学，已经不是去搞章句训诂，而是重在讲明大义，所以要选取一些“心性疏通”的人去治经义。他所选取的人，还要“有器局、可任大事”，说明他的“讲明六经”是要“学以致用”。看不出胡瑗与佛道两家在学术上的直接关系，但他并不象石介那样地排斥佛老。就对北宋的学术影响来说，在所谓宋初三先生当中，胡瑗是远远高于孙复

和石介的。

《宋元学案》的诸作者，对于王安石（1021～1086）都存有偏见，故把《荆公新学略》置诸最后，这是很不公允的。

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是一个援法入儒的人；作为学问家的王安石，又是一个把儒释道三家的义理融合为一的人。他曾当面向宋神宗说：“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相合犹符节也。”“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异。”^①又，释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载有一事说：“舒王（按即王安石）嗜佛书，曾子固欲讽之，未有以发。一日会于南昌，潘延之（名嗣兴）亦至，延之谈禅，舒王问其所得，子固熟视之。已而论人物，曰：‘某人可抨。’子固曰：‘弃用老而逃佛，亦可一抨。’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学者读其书，义理之来，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子固笑曰：‘前言戏之耳！’”我认为这段记载也是可信的。

王安石还曾说：“圣人之大体，〔后世〕分裂而为八九，……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也。”^②而他本人不但对佛经做了《楞严经解》，还对《老子》作了注释。

《宋史·王安石传》说他对于“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是事实。他与新党的吕惠卿等人共同撰写的《三经新义》，也都是重在发挥义理而不是重训诂名物方面的。

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在《王氏杂说》的《解题》中引有蔡卞所作《王安石传》（可能是《神宗实录》中的附传）中的一段话，说道：“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在《字说》的《解题》中则又说道：“安石晚年闲居金陵，以天地万物之理著为此书，与《易》相表里云。而元祐学者指其糅

杂释老，穿凿破碎，聋瞽学者，特禁绝之。

《杂说》、《字说》两书俱已失传，《杂说》的内容不可知。《字说》则是讲文字学的，亦即属于“小学”一类的书，王安石却结合天地万物之理去阐发文字的涵义，可知他和他的同党们所编纂的《三经新义》更必然是把重点放在阐发义理方面的。而他所阐发的义理，如所周知，又都是为他的变法服务的。这也就是说，他的通经也是为了致用的。

周敦颐(1017~1073)，即所谓“濂洛关闽”中之“濂”(他是湖南道州营道人，家居濂溪)。他的学术渊源是：陈抟得《先天图》于麻衣道人，以授种放，种放授穆修与僧寿涯，穆修以《无极图》授周敦颐，而僧寿涯则以“先天之偈”授周。因此，受佛学影响很深的陆九渊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不太推重。他曾写信给朱熹说：“希夷之学，老氏之学也。”“《老子》首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极而太极即是此旨。老氏学之不正，见理不明，所蔽在此。”

朱熹和张栻，受道家思想影响比陆九渊多，对周敦颐就都极为推崇。朱熹说他“奋乎百世之下，乃深探圣贤之奥，疏观造化之原，而独心得之，立象著书，阐发幽秘，辞虽约，而天下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毕举。”^③张栻说他“崛起于千载之后，独得微旨于残编断简之中，……孔孟之意于以复明。”^④试看朱熹和张栻称颂周敦颐的这些话，与蔡卞称颂王安石的那些话是何等的相似！

程颢程颐兄弟把儒家学说发展得更抽象、更玄妙精微，并且也更着重于个人身心的修养。其后再经程门的一传、再传的弟子们的宣扬传布，到南宋便形成了理学家这一流派。

北宋的这些学者们，全都是以致广大、尽精微为其治学宗旨的。唯其要致广大，故都有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唯其要尽精微，故都要把儒家学说的义理进行深入的探索。以这一治学宗旨为标准，除上举诸人之外，范仲淹、李觏、欧阳修、司马光以及三苏